

道教始祖张陵形象的文化嬗变

◎ 汤 洪 李 丹

【摘要】 道教产生于西蜀鹤鸣山(鹤鸣山),由张陵糅合先秦道家学说,创制道书,将原始道教“五斗米道”阐扬光大。《三国志》始载张陵,历史信息异常简略。《华阳国志》《后汉书》不断增补史料,但张陵历史人物形象依然模糊。魏晋时期,道教繁盛,《神仙传》《魏书》已敷演出更为丰腴的张陵形象,遂使张陵从史述走向仙化,并完成塑造张陵道教开山始祖的天师形象。

【关键词】 道教;张陵;鹤鸣山;《神仙传》

【中图分类号】 B95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139(2024)4-0177-8

东汉末年,沛国丰人张陵经由徐州迁居入蜀,在西蜀大邑鹤鸣山^①创“五斗米道”,将道教发扬光大,影响中华文化至深至远。翻检文献,我们发现道教创始人张陵以及道教开创之初的教义教规,历代史志记载甚为简略。张陵是如何从史书中粗略干瘪的记载逐渐演变为周详丰腴的人物形象,这种演变浸透着怎样的文化内涵,本文拟钩稽历史文献,力图还原这一生动的嬗变历程。

一、《三国志》:最早记载张陵史实

成书于西晋初年的《三国志》始有张陵事迹的零星记载,是书《魏书·张鲁传》载:

张鲁字公祺,沛国丰人也。祖父陵,客蜀,学道鹤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

① 西蜀大邑鹤鸣山为道教发源地,此为早期历史文献所确载,历来并无异议。但随着文化旅游业的发展,阑取名人名胜以入本乡,已有愈演愈烈之势。在此背景下,道教发源地再起争辩,仅四川域内,即有大邑鹤鸣山(卫复华:《中国道教(五斗米道)发源地鹤鸣山》,《宗教学研究》1989年Z1期)、剑阁鹤鸣山(蔡运生:《道教的发源地——剑阁鹤鸣山》,《宗教学研究》1993年Z2期)、洪雅瓦屋山(卿希泰:《瓦屋山道教文化考察刍议》,《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4期)、青城山(卞再彬:《中国道教的发源地——青城山》,《中国妇女》2001年第6期)等不同异说,诸说皆认同道教产生于蜀山蜀水。检索唐宋以前史志,张陵所创道教祖庭为大邑鹤鸣山似已为定论,袁庭栋有详考(袁庭栋:《道教祖庭鹤鸣山考》,《四川文物》1995年第3期)。此外,也有学者认为,道教应是齐鲁文化特别是齐文化滋生的结果(梁宗华:《齐鲁文化对早期道教的影响》,《东岳论丛》2005年第6期)。稽考史志,我们发现,巴蜀大地产生道教的时间甚早甚古,其他缺乏历史文献支撑,因而不足为人信服。

【作者简介】 汤 洪,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国际中文教育学院、巴蜀文化与教育研究中心教授;
李 丹,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四川 成都 610066。

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①

《三国志·张鲁传》可为我们提供如下信息：

1.张陵身世。张陵以及张鲁本为沛国丰县人，沛国大致位于今江苏徐州和安徽淮北一带，丰县在徐州西北。张陵、张衡、张鲁为祖孙三代，传“道”为三代家传，子承父业、代有承传。

2.张陵迁蜀学道。张陵不远千里，自丰县迁移至蜀，客居蜀中，学道于鹤鸣山中。学道于人，说明鹤鸣山中早有传道之人，他或即是张陵的师傅，可惜文献并无此人其他更多记载。

3.张陵造作道书。“造”为汉代常用语词，表示创新性的论述，如《史记·屈原列传》“造为宪令”^②。“作”用于文字书写亦含有创新性的创造之意，如《论语·述而》孔子言“述而不作”^③。张陵创造性创制了道书，创制道书的目的和用途，陈寿说是为了迷惑百姓。《三国志》为官修史书，陈寿如此陈述，或许是其出于身份考量的阶层特定术语。张陵为了从理论上使信徒信服其说，以达到聚集更多信众，从而造作道书，似乎也是文献材料背后的应有之义。

4.张陵收纳五斗米。跟从张陵受道的信徒，须交纳五斗信米作为入道的会费。张陵在世时，社会世俗称他的这帮信徒为“米贼”。“米贼”一名，颇有意思，这肯定不是张陵信徒的自称，或为当时官方的他称，亦或为当时世俗民众的他称，张陵的信众如何自称，《三国志》并未记载。

王家祐认为“可以肯定张陵、张鲁的‘五斗米道’，是在巴蜀民俗基础上建立起来的”^④，道教产生于西蜀鹤鸣山，由张陵糅合先秦道家学说，创制道书，将原始道教“五斗米道”真正阐扬光大，此应符合早期道教发生、发展的历史真实。王家祐说：“张陵的天师道（或‘正一盟威’）是黄老儒墨在巴蜀（四川）地区的土壤上开放的一枝奇花。是吸取了巴（蜀）族的原始巫术（鬼道）与地区传统民俗而创成的。在建成天师正一教的过程中是有团结又有斗争的，这就是对巴人‘五斗米道’的融合和改造，张陵在巴蜀巫道基础上改造创立的天师道是真正的‘道教’，而‘五斗米道’只是构成汉族大集团中部分人民的（氏羌族系的）原始宗教（道教的主根）。”^⑤ 综上，张陵是道教的开山始祖，他凭借自己过人的才华，创制了道教早期理论书籍，并将理论运用于传教实践，踵事增华，阐扬大邑鹤鸣山道教，让道教第一次真正走向民间并贴近民众心理，成为广大世俗民众的精神信仰，这是《三国志》载录的史实。

二、《华阳国志》：进一步增补史料

东晋常璩《华阳国志·汉中志》记张陵事迹较《三国志》并没有多少增补，但记张陵之孙张鲁事迹却较《三国志》更为详细：

汉末，沛国张陵学道于蜀鹤鸣山，造作道书，自称“太清玄元”，以惑百姓。陵死，子衡传其业。衡死，子鲁传其业。鲁字公祺，以鬼道见信于益州牧刘焉。鲁母有少容，往来焉家。初平中，以鲁为督义司马，住汉中，断谷道。鲁既至，行宽惠，以鬼道教。立义舍，置义米、义肉其中，行者取之，量腹而已，不得过，过多云鬼病之。其市肆贾平亦然。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学道未信者谓之“鬼卒”，后乃为“祭酒”。巴、汉夷民多便之。其

① 《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第263页。

② 《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2481页。

③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481页。

④⑤ 王家祐：《道教论稿》，巴蜀书社，1987年，第126页，第153—154页。

供道限出五斗米，故世谓之“米道”。^①

《华阳国志》所载张陵事迹可为我们提供如下信息：

1.张陵身世。与《三国志》基本无异，但《华阳国志》增补张陵自称为“太清玄元”，“太清玄元”或为道书所谓“太清玄元无上三天无极大道太上老君”，此处所指的是“张陵称自己是太上老君”还是“张陵称自己受传于太上老君”，我们不得而知。

2.张陵迁蜀学道。与《三国志》基本一致，但《华阳国志》已明确记载张陵学道之地是蜀之鹤鸣山。《华阳国志》之“鹤鸣山”与《三国志》之“鹄鸣山”是否为同一地名？“鹄”“鹤”语音相近、意向内涵相似，古常通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载有《黄鹄歌》，逯钦立注“鹄”谓：“《初学记》作鹤，《白帖》同。”^② 陆游寓居蜀西临邛所作《书寓舍壁》有“鹄鸣山谷曾游处，剩欲扶犁学老农”句，陆游自注谓：“鹄鸣一名鹤鸣，在邛之大邑县。”^③ 由此可知，《华阳国志》所载之“鹤鸣山”与《三国志》所载之“鹄鸣山”实同指今日蜀西大邑境内之鹤鸣山。

3.张陵造作道书。与《三国志》所载相同。

4.张鲁收纳五斗米。《华阳国志》记“五斗米”事与《三国志》有较大出入。

《华阳国志》更为详细记述了张陵之孙张鲁的事迹。张鲁擅长“鬼道”。张鲁母亲年老而有少容，且与刘焉有亲密关系。张鲁遂以这双重因缘见信于益州牧刘焉。值得注意的是，张鲁所擅的“鬼道”是否即是《三国志》所载自张陵家传三代而来的“道”，《华阳国志》并未明言。张鲁得信于刘焉，刘焉封张鲁为督义司马，前往汉中镇守褒斜谷要道。张鲁镇守汉中期间，施行宽惠政策，并传播“鬼道”于民间。张鲁“鬼道”内部有修行层级，“学道未信”的初级者谓之“鬼卒”，高级者谓之“祭酒”。张鲁传道的方式，颇为新奇。于路旁修建房屋，名为“义舍”，在房屋内放置米、肉，名为“义米”“义肉”。过路人以吃饱肚子为原则，可以随意拿取，但不得拿取过量，过量则“鬼道”之“鬼”即会使之生病。同样，市场售卖货物，商人要价也不得过高，过高则“鬼”亦将病之。因此，张鲁在汉中的“鬼道”措施颇得巴、汉广大地区民众的拥护。信徒入道须交纳“五斗米”的“法信”方可获得“命籍”，因此，当世称之为“米道”。寻检《华阳国志》所载，此“五斗米”之教规似为张鲁所创，与《三国志》张陵创“五斗米”的记载相异。此外，世俗“米道”之他称，与《三国志》记载“米贼”也有所不同。

《华阳国志》增补史料说明，张陵已经开始创制使用“太清玄元”这类道教术语，逐步使道教神祇系统化，遂让道教第一次真正形成有体系的宗教仪轨，为光大道教提供必备的系统教仪。此外，信徒入教尚需有五斗米的物质贡献，世称“五斗米道”。张陵此举，不仅可以聚集财富，从而利用富裕钱财发展更多门徒、扩大势力，同时，也可以依赖充足的物资保障深研教理，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凡此种种，共同促进早期道教逐渐走出偏远的鹤鸣山区，不断向成都平原及更远区域扩散，成为民间广大信众的精神信仰。

三、《后汉书》：综摄前代史料

南朝刘宋范晔《后汉书·刘焉传》相关记载明显采录综合增补《三国志》《华阳国志》而成，

① 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第114页。

②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第108页。

③ 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682页。

故其所记与二书差异不大。《后汉书》记张鲁事迹应有另外的史料来源，因此更为详赡：

沛人张鲁，母有姿色，兼挟鬼道，往来焉家，遂任鲁以为督义司马，（遂）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掩杀汉中太守苏固，断绝斜谷，杀使者。鲁既得汉中，遂复杀张修而并其众……鲁因袭取之，遂雄于巴汉……曹操破张鲁，定汉中。鲁字公祺，初，祖父陵，顺帝时客于蜀，学道鹤鸣山中，造作符书，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辄出米五斗，故谓之“米贼”。陵传子衡，衡传于鲁，鲁遂自号“师君”。其来学者，初名为“鬼卒”，后号“祭酒”。祭酒各领部众，众多者名曰“理头”。皆校以诚信，不听欺妄，有病但令首过而已。诸祭酒各起义舍于路，同之亭传，县置米肉以给行旅。食者量腹取足，过多则鬼能病之。犯法者先加三原，然后行刑。不置长吏，以祭酒为理，民夷信向。朝廷不能讨，遂就拜鲁镇夷中郎将，领汉宁太守，通其贡献。^①

《后汉书》所载张陵事迹可为我们提供如下信息：

1.张陵身世。与《三国志》《华阳国志》无异。

2.张陵迁蜀学道。《后汉书》明确记载张陵入蜀学道的时间是汉顺帝年间，较《华阳国志》所记“汉末”更为确切。

3.张陵造作符书。与《三国志》《华阳国志》“造作道书”所不同，《后汉书》所记为张陵“造作符书”。张陵自创一套神秘的符篆图文，以方便向民众传授其教理，此应符合世俗宗教的实际情形。《后汉书》似已说明“符”和“道”之间的关系，“造作符书，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辄出米五斗”。自此，《三国志》《华阳国志》所记“道书”的内容形式即有较为清晰的轮廓，此为道教符篆派之原初理论形式。

4.张陵收纳五斗米。与《三国志》所记无异。

综合《三国志》《华阳国志》《后汉书》等史料，“五斗米道”能成为早期道教有影响力的流派，与张陵家族几代人不间断的承传赓续关系甚大。张陵去世，其子张衡亦传承家学，继续发展“五斗米道”。“五斗米道”真正为世人所关注并为官方所重视，最得力于张鲁。特别是《后汉书》的记载，可为我们提供张鲁发扬“五斗米道”的详细历程。东汉末年张鲁以鬼道并以其母与刘焉的特殊关系见信于益州牧刘焉。刘焉任命张鲁为督义司马，张鲁与别部司马张修一同将兵斩杀了汉中太守苏固。夺取汉中后，张鲁又谋杀张修吞并其部卒，因而得以雄踞汉中，势力范围扩大至巴、汉广大地区。张鲁势力强大，东汉朝廷因自身风雨飘摇而鞭长莫及，不得已拜张鲁为镇夷中郎将，领汉宁太守。张鲁在汉中地区大行祖父张陵所创的“五斗米道”，自号“师君”。张鲁行事宽惠，以鬼道教化民众，创设“义舍”，放置米、肉于公共房屋之内，行者根据自己的需要量腹取食，此举极似儒家所谓“大同”，因而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和响应。此外，张鲁还将信徒分为“鬼卒”“祭酒”“理头”等不同层级，这样的组织架构不断向外开枝散叶，从而迅速吸纳信徒，扩大影响。张鲁雄据汉中三十余年，后归降曹操，官拜镇南将军，封阆中侯，食邑万户。张鲁承袭家学，利用政治与军事的多重力量，将宗教与政治结合，遂使宗教在民间得以更为顺畅和广泛的传播。道教经张陵开坛，历两代承传，在张鲁之时，借着张鲁割据汉中三十余年的政治便利，已然发展成为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大众宗教。

① 《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2432—2436页。

四、《神仙传》：使张陵形象走上仙化之途

《后汉书》《三国志》《华阳国志》所载张陵尚为历史人物，与神仙并无关联。张陵所行事迹也是世俗人事，与仙家内炼飞升也没多大牵连。在东晋葛洪《神仙传》以及北齐魏收《魏书》的记载中，张陵及其创设的“五斗米道”开始被仙化，以符合教徒信仰需求。《神仙传·张道陵》中张陵已嬗变为“天师张道陵”，其人有御神之法、飞升之术：

天师张道陵，字辅汉，沛国丰县人也。本太学书生，博采五经，晚乃叹曰：“此无益于年命。”遂学长生之道，得《黄帝九鼎丹经》，修炼于繁阳山。丹成服之，能坐在立亡，渐渐复少。后于万山石室中，得隐书秘文及制命山岳众神之术，行之有验。

初，天师值中国纷乱，在位者多危，退耕于余杭，又汉政陵迟，赋敛无度，难以自安，虽聚徒教授，而文道凋丧，不足以拯危佐世。陵年五十，方退身修道，十年之间，已成道矣。闻蜀民朴素可教化，且多名山，乃将弟子入蜀于鹤鸣山隐居。既遇老君，遂于隐居之所，备药物，依法修炼，三年丹成，未敢服饵，谓弟子曰：“神丹已成，若服之，当冲天为真人，然未有大功于世，须为国家除害兴利以济民庶，然后服丹即轻举，臣事三境，庶无愧焉。”老君寻遣清和玉女，教以吐纳清和之法，修行千日，能内见五藏，外集外神，乃行三步九迹，交乾履斗，随罡所指，以摄精邪，战六天魔鬼，夺二十四治，改为福庭，名之化宇，降其帅为阴官。先时蜀中魔鬼数万，白昼为市，擅行疫疠，生民久罹其害，自六天大魔推伏之后，陵斥其鬼众，散处西北不毛之地，与之誓曰：“人主于昼，鬼行于夜，阴阳分别，各有司存，违者正一有法，必加诛戮。”于是幽冥异域，人鬼殊途，今西蜀青城山有鬼市，并天师誓鬼碑，石天地、石日月存焉。^①

《神仙传》所载天师张道陵事迹可为我们提供如下信息：

1.张道陵身世。相较于《三国志》《华阳国志》《后汉书》所记张陵身世，《神仙传》敷衍增饰了张道陵更为丰富的生平事迹。历史人物张陵在《神仙传》中已经演变为张道陵，且已追称为带有浓厚道教色彩的“天师”。除张道陵之名外，还有“辅汉”这寓意深长的字号。张道陵为汉末太学书生，出身官学，且博采五经，学识渊博。

2.张道陵于繁阳山学长生之道。张道陵晚年慨叹学识无益于延年益寿，遂往繁阳山学长生之道，并得《黄帝九鼎丹经》潜心修炼丹药。丹成，服食丹药后，可以在刹那间幻化隐去人形，且身体变得越来越年轻。

3.张道陵于万山石室得秘术。秘术具体呈现于两个方面，神秘书籍所载神秘文字，制御山川众神的神秘仙术。此“隐书秘文”或即为《三国志》《华阳国志》所载“道书”和《后汉书》所载“符书”。

4.张道陵退耕余杭十年成道。汉末纷乱，朝廷在位者多无善终，朝政凋敝，在此情形下，拯危佐世几无可能。因此乱离之世，天师张道陵在五十岁时退耕于余杭，退隐余杭十年遂修成道业。

5.张道陵迁蜀传道。张道陵退隐余杭十年，后听说蜀地人民朴素，可以教化，于是带领弟子入蜀鹤鸣山隐居。《神仙传》此说已不同于《三国志》《华阳国志》《后汉书》所记“学道”于鹤鸣山。葛洪塑造的张道陵形象，已是开创性的道教天师开山始祖。

6.张道陵于鹤鸣山三年炼成仙丹。张道陵隐居鹤鸣山时，遇见“老君”，于是得炼丹秘法，三

^① 葛洪撰，胡守为校释：《神仙传校释》，中华书局，2010年，第190—191页。

年丹成。如果服食仙丹，即可轻举飞升为神仙真人。但是张道陵并没有急于服丹，而是给弟子们陈述了自己的心愿。张道陵说自己还没有建功立业，为国家除害兴利，拯救黎民百姓，因此不能即刻飞升远离尘世。

7.张道陵与清和玉女修行千日得内视。张道陵在鹤鸣山遇仙人“老君”，“老君”遣送清和玉女并教以吐纳清和之法。张道陵修行千日，可以内视五藏，外行禹步“三步九迹”，内外统摄，精气纯一。

8.张道陵镇伏六天魔鬼。张道陵修得“交乾履斗，随罡所指”的仙术后，曾大战六天魔鬼，降服魔界统帅，夺得二十四治所，将魔鬼统领之地变为福庭。

9.张道陵治理蜀中魔界。在张道陵入蜀前，蜀中魔鬼有数万之多，不分白天黑夜，魔界皆掌控生民的运命，使得民生深患其害。自张道陵降服六天魔鬼后，驱遣鬼众到西北不毛之地，并与之立誓，生人主宰白天，鬼众只能在夜间活动，阴阳分别，不可逾越，越界者将被诛戮。自此以后，“幽冥异域，人鬼殊途”，世间从此太平。

10.张道陵誓鬼遗迹存于青城山。《神仙传》记载青城山有鬼市，葛洪还明确记载当时青城山尚遗留有张道陵誓鬼碑以及石天地、石日月。

综上，由葛洪《神仙传》撰述敷陈，张陵人物形象更加丰腴。《神仙传》第一次记“张陵”为“张道陵”，虽只有一字变化，内蕴却天壤有别。葛洪增添张陵出身太学并博采五经的官方学术背景，再追补张陵学术源自《黄帝九鼎丹经》，将道教的源头远溯至渺远的黄帝时代，遂使道教流派自古而下、一脉传承、渊源有自。葛洪又以儒家圣人标准敷设张陵拯危佐世之功。张陵携弟子入蜀鹤鸣山隐居炼丹，遇老君（或即为太上老君）遣清和玉女教以吐纳，修行内视，又降伏鬼众，令人鬼各有司存。渐行渐远渐无穷，葛洪《神仙传》所描述的张道陵形象在层累叠加之下已与《三国志》等史书所记张陵事迹相去甚远。葛洪将张陵与道教紧紧融合，并不断塑造道教天师的神威圣力，使道教人物逐渐仙化并远离人间烟火，创设道教开创人物的神圣特性。据《神仙传》记载，道教自初创早期便流播至云南的传播路径亦得以窥见。

五、《魏书·释老志》：融合历史与仙话的再次塑形

北齐魏收《魏书·释老志》重点叙述佛教传播历程，概述道教发展简史及寇谦之改革经过，因此，张陵并不是叙述重点，着墨不多。《释老志》所载张陵明显融合《三国志》《华阳国志》《后汉书》等历史文献，同时，魏收也摄取了《神仙传》的全新塑造，将历史与仙话融为一体，是书所记张陵，亦具有“化金销玉，行符敕水”之功、“羽化飞天，消灾灭祸”之术：

道家之原，出于老子……如此之文，不可胜纪。其为教也，咸蠲去邪累。澡雪心神，积行树功，累德增善，乃至白日升天，长生世上。所以秦皇、汉武，甘心不息。灵帝置华盖于濯龙，设坛场而为礼。及张陵受道于鹤鸣，因传天官章本千有二百，弟子相授，其事大行。斋祠跪拜，各成法道，有三元九府、百二十官，一切诸神，咸所统摄。又称劫数，颇类佛经。其延康、龙汉、赤明、开皇之属，皆其名也。及其劫终，称天地俱坏。其书多有禁秘，非其徒也，不得辄观。至于化金销玉，行符敕水，奇方妙术，万等千条，上云羽化飞天，次称消灾灭祸。故好异者，往往而尊事之……谦之守志嵩岳，精专不懈，以神瑞二年十月乙卯，忽遇大神，乘云驾龙，导从百灵，仙人玉女，左右侍卫，集止山顶，称太上老君。谓谦之曰：“往辛亥年，嵩岳镇灵集仙宫主，表天曹，称自天师张陵去世已来，地上旷诚，修善之人，无所

师授”……牧土之来，赤松、王乔之伦，及韩终、张安世、刘根、张陵，近世仙者，并为翼从。牧土命谦之为子，与群仙结为徒友。幽冥之事，世所不了，谦之具问，一一告焉。^①

《释老志》所载张陵事迹可为我们提供如下信息：

1.张陵受道于鹤鸣。此与《三国志》《华阳国志》《后汉书》所记基本一致。

2.张陵传《天官章本》。张陵在鹤鸣山学道时，曾传习《天官章本》。张陵不但自己传习《天官章本》，其弟子皆相传授。因此书有不可宣示的禁秘，故此书只亲授门徒，而不外传。是书内容有劫数之说，此说或受佛教“劫波”世界观影响，劫终天地将俱毁。此《天官章本》与《三国志》《华阳国志》所记道书以及《后汉书》所记符书是否同一，我们不得而知。

3.张陵统摄诸神。张陵传习《天官章本》，因有此斋醮仪范，且凭着三元九府、百二十官，张陵遂有统摄一切诸神的本领。

4.张陵深怀奇方妙术。张陵因修习《天官章本》，而得诸多法术，有化金销玉、行符敕水之秘法。此外，还可羽化飞天、消灾灭祸。张陵因有此等妙法，故吸引众多信徒前往奉事入道。

综上，《释老志》承续《神仙传》，继续牵连弥合累加张陵创设的道教与先秦道家之间的内在关联，以一脉相承的发展线索勾勒道教的演变轨迹。《释老志》认为，道教本是独立于佛教之外的宗教流派，自老子开源，后世继起者薪尽火传、代不乏人。《释老志》仍记载张陵受道鹤鸣山，受道暗示张陵另有所承，惜史书无载。张陵所传《天官章本》是否即为《三国志》所谓道书，我们不得而知。张陵所创“五斗米道”之所以能大行其世，在于弟子众多，且代有传人，绵延不断。《释老志》记载张陵其道，更有价值的是其斋醮仪法。张陵所创制的一套教法仪式“各成法道”，已经具备宗教仪规的理论性和系统性。张陵创制出道教神祇三元九府、百二十官，皆统摄于一人。

结 语

张陵是史书所载道教创始人，其形象最初仅在西晋初年成书的《三国志》有零星记载，他自沛国迁蜀学道，传“道”于其子张衡、其孙张鲁，造作道书，收“五斗米”作为入道会费，让道教第一次真正走向民间并贴近民众信仰。《华阳国志》增补张陵始创“太清玄元”这类道教术语，可以探知道教神祇系统化的早期过程，而系统的理论体系则利于早期道教逐渐走出偏远的鹤鸣山区，不断向成都平原及更远区域扩散。道教经张陵开坛，历两代承传。据《华阳国志》与《后汉书》记载，在张鲁之时，道教借用政治与军事力量发展成为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大众宗教。尔后，《神仙传》进一步丰富张陵形象，首次将张陵及其创设的“五斗米道”仙化，并远离俗世人间，塑造道教开创新人物的神圣特性，而道教自初创早期便流播至云南地区的传播路径亦得由《神仙传》为人所知。继《神仙传》仙化叙事，《释老志》牵连张陵所创道教与先秦道家的历史关联，详述张陵所创教法仪式，谓张陵能统摄诸神，身怀奇方妙术，为“近世仙者”，融合历史与仙话再次塑造张陵形象。综观《三国志》《华阳国志》《后汉书》《神仙传》《魏书》等文献的书写叙事，道教的创立、发展与流播历程尚清晰可见，而张陵作为道教始祖的天师形象，亦在从史述走向仙化的过程中不断增添、塑形和固化。

^① 《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3048—3052页。

On the Cultural Evolution of the Image of Zhang Ling, the Founder of Daoism

Tang Hong & Li Dan

Abstract: Daoism originated from *Huming/Heming* Mountain (鹤鸣山/鹤鸣山) in western Sichuan. With the absorption of the pre-Qin Daoist doctrine, Zhang Ling created Daoist books and established “*wudoumi* Daoism (五斗米道)”. He was first recorded in *San Guo Zhi*, with quiet brief historical information. Later, *Huayang Guo Zhi* and *Hou Han Shu* continued to add historical materials about him, but his image was still vague. Daoism flourished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Shenxian Zhuan* and *Wei Shu* has presented a fuller image of him, which changed from a historical figure to a religious immortal, and Zhang was constructed as *tianshi* (天师) and the founder of Daoism.

Keywords: Daoism; Zhang Ling; *Heming* Mountain; *Shenxian Zhuan*

(责任编辑 彭东焕)